



科学家发现甘肃瓜州十多处古遗址

本报兰州10月16日讯(记者王静、刘晓倩)今天,由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牵头,与兰州大学、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联合在兰州举行“丝绸之路瓜—沙段遥感考古与环境变迁学术研讨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科学家利用遥感技术,在甘肃瓜州—敦煌间新发现5处古城遗址、2处民居村落中的13处房屋遗址以及1段古渠道遗址、1条古道遗址和1处陶窑遗址,并对其规模、形制等进行了测量。

据悉,这是将遥感技术与传统考古手段相结合,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瓜州考古中一次性发现古遗址最多的一次,表明遥感技术在考古应用中能发挥巨大作用。

瓜州—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干道,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交通史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价值。然

而,戈壁、沙漠以及荒漠的阻隔,给传统田野考古带来了极大困难。利用遥感技术开展考古调查,可以为考古学家装上“透视眼”,使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发现消失多年的历史遗迹。

此次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人员利用中—巴资源卫星、陆地资源卫星、中国资源二号、美国快鸟等中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结合历史文献以及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对瓜—沙段进行了研究。涉及区域包括芦苇沟古绿洲、疏勒河古河道、汉长城遗址等入迹罕至地区,并据此新确定了一些遗址的疑似点。

10月中旬,研究人员与兰州大学、甘肃省考古所、瓜州文物局(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联合组成科学考察队,对瓜—沙段进行了野外考察验证。

科技界纪念钱三强百年诞辰

中科院中国科协领导号召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精神

本报北京10月16日讯(记者丁佳)今天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上午,由中科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共同举办的“钱三强百年诞辰暨钱三强何泽慧科技思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座谈会上,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评价称,钱三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是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主要发现者;他是我国核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为中科院的建立和新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奠基性贡献;作为“两弹元勋”,钱三强为国防建设和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同

时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为我国重大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春礼指出,钱三强作为卓越的科学家、杰出的科技界领导人、优秀的共产党员,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是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他说,科技工作者要学习钱三强坚定执着、报国尽忠的爱国情怀;学习他甘为人梯、育才爱才的大家风范;还要学习他胸怀全局、勇于建言的思想品质。

白春礼要求中科院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四个率先”要求统领中科院改革、创新和发展各项工作,继承并发扬以钱三强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凝聚力量,攻

克难,追求卓越,不断创新,不辜负党和国家人民给予我们的厚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申维辰表示,学习钱三强、何泽慧的科学思想和奉献精神,就是要继承他们大德敦化的气质和品格,自觉把科协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切实履行好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桥梁纽带的基本职责,更好地服务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大局。

他倡议大家高举老一辈科学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旗帜,充分发挥科协组织作为科普主要社会力量的带头作用,广泛开展高

效务实的科普活动,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杨长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詹文龙,党委副书记方新,钱三强的子女钱民协、钱思进,20余位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钱三强、何泽慧的亲属、学生、生前同事好友等出席会议。

据了解,为纪念两位先生,中科院还组织编写出版了《钱三强年谱长编》,并发行了钱三强科技纪念封和何泽慧科学纪念封;中国科协组织编写出版了《钱三强传》、《何泽慧传》等图书。

核工业界基金委等座谈追思钱三强“以身许国”崇高情怀

本报北京10月16日讯(记者潘峰)10月16日是“两弹一星”元勋、享誉世界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钱三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今天在京举行座谈会,追思老一辈核工业科学家“以身许国”的崇高情怀。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以及钱三强先生的亲属和学生等近200人出席座谈会。

杨卫说,钱三强先生为“两弹”的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他始终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划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尤其是核工业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并积极倡导学科交叉,策划组织了科学与文化论坛,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和协调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杨卫表示,钱三强以身许国、肝胆相照的大师风范,自力更生、协同攻关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志在创新的科学作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核工业是国家安全的脊梁,我们作为核事业的后来人,应当把个人兴趣、人生价值与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统一起来,兴核强国、造福社会,这是钱三强先生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启迪之一。”孙勤说。

1948年,钱三强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投身于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以及核武器的研制中,为“两弹”的成功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钱三强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积极投入到国家科研工作的恢复和组织工作中,参与了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高能加速器等等当时国家众多重大科技工程的前期组织和筹划工作。1999年,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生活和工作条件,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投身于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以及核武器的研制中,为“两弹”的成功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钱三强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积极投入到国家科研工作的恢复和组织工作中,参与了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高能加速器等等当时国家众多重大科技工程的前期组织和筹划工作。1999年,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陈竺调研中科院广州生物院

本报广州10月16日讯(通讯员王炳坤、朱丹萍 记者李洁尉)记者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获悉,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到该院调研。

陈竺一行参观了生物院科研园区,了解临床治疗性干细胞制备平台及研究生公寓的建设情况,听取了生物院院长裴端卿关于研究院成果产出与转化、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并和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陈竺表示,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建院三年来,在中科院、广东省、广州市共建三方的共同领导下,全院同志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他指出,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时期,珠三角地区拥有全国最好的创新环境和土壤,会聚了各种优势资源,为生物院瞄准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需求以及“顶天立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陈竺希望生物院再接再厉,不断出新的成果。他还对生物院科技人员提出了两点期望,一是要有强大的科技自信,能够耐得住寂寞,敢于开辟新领域,坚持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相结合,做真正原创性的工作;二是要努力加强成果转化,争取在转化医学等领域有创新性和实质性的贡献,造福全国人民健康。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黄宇生、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力等陪同考察。

周济谢克昌当选美工程院外籍院士

本报北京(记者陆琦)在日前举行的美国国家工程院学术年会上,美国国家工程院公布了2013年新当选的69位院士和11位外籍院士名单。其中,有两位外籍院士来自中国,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和谢克昌。

周济当选的理由是他在数控、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设计优化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谢克昌当选的理由是他对煤分子结构及其反应性的理解以及在现代清洁煤化工领域中的引领作用。

当天,周济由于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此次院士证书授予仪式,谢克昌作为代表出席。谢克昌在接受证书后表示,这一荣誉不仅是他个人的。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出席大会的全体院士,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是他的科研团队、中国的工程科技界,进而是数十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实力快速发展的中国。有了国家和人民的培养和支持,他才有施展才华的可能,进而取得今天的成就。

2013年度新当选院士和外籍院士的证书颁发典礼由美国国家工程院秘书长兰斯·戴维斯主持。近千人的学术大厅座无虚席。新当选的院士一一登台被授予证书。

据了解,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美国工程界最高荣誉之一,授予那些在工程领域内从事研究、实践和教育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以及在新兴和发展中的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工程教育方面研发新方法的开拓者。

科学时评

主持:张明伟 邮箱:rqju@stimes.cn

从两份榜单看中国科技界的责任

道田

近日,德国安联集团在其2012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金融资产达6.5万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但人均净资产在全球仅排名第38位,人均值为4720欧元,还不如东南亚的小国马来西亚。

笔者手上还有一份数据:2012年,我国GDP已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对于人均GDP,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仅是5400多美元,排在80名开外。

如果上述两份榜单都是可靠的,那么我国人均金融资产大大超过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这说明前些年我国金融行业一马当先,获得了远远领先于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我们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确实到了必须夯实提速的阶段了。

所幸的是,国家领导人和决策部门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今年7月份发出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视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则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从科技界的视角来看,对于实现“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这个目标,其能做的比较有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科技资源的投入方式或投入领域。但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却是科技界此前做得不够且能改进的地方。

具体来说,一是创新活动甚少由产业发展牵引,科技活动来自论文、回归论文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二是创新力量缺乏有效整合,导致所谓的科技成果难以成链、成体系且没有市场价值。于是,虽说我们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人力资源和每年万亿元规模的研发投入,但科技成果供给不足、好项目点灯难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因此,重整实体经济,科技界其实也有责任,且随着全国上下对于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共识,科技界角色已由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向源头供给、核心驱动的创新引领使命转变。对于国家要求和时代形势推动下的这一重要角色转型,科技界不仅要积极尝试或配合科技与金融结合等各种新式手段,更重要的是深化对现有科技资源和创新力量的存量改革,促进创新要素重组增效,迎接奥巴马提出的“研究室领导生产时代”的到来。



10月16日,大钢哈斯科钢渣综合利用公司当班工人在对生产出来的专用化肥进行包装。近日,由大钢集团和美国哈斯科公司投资建设的钢渣综合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这是中国首个、全球最大的钢渣综合利用项目。投产后,实现回收不锈钢废钢2万吨,生产钢渣肥料50万吨、路基材料34万吨、钢渣超细粉30万吨等。这些均为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前景良好。特别是具有特殊功效的专用肥料,对于辅助“三农”、改善土壤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张轩翰摄(新华社供图)

美国天文会议拒绝中国研究人员参加。专家认为这并非歧视,无须过度解读——国际合作仍在期待中国身影

■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一场原本普普通通的天文会议,如今正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第二届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会议,原本定于11月4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然而,作为会议主办方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借国家安全为由,将申请参会的6名中国研究人员拒之门外。随后,美国的天文学家对此表达了强烈反对,并决定退出该会议。

10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我们认为学术性或科研性活动不应被政治化。”事情的缘起究竟是怎样的?现在进展如何?中国科学家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中国科学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

“不幸”后的“期待”

王吉(音译)是一名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也是此次被禁止参会的6名科学家之一。他的导师戴布拉·费舍尔(Debra Fischer)

在得知此事后,毅然决定带领团队退出该会议。

“让中国和别国的科学家参与此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欣赏这些中国同事们作出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站在他们这边,来反对限制性政策的原因。”戴布拉·费舍尔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同样提出退会的,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格夫·马尔西(Geoff Marcy)。在与《中国科学报》记者对话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如果会议主办方能接纳中国科学家,我会同意重新参会。我期待能在会场上见到并拥抱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

压力之下,NASA决定重新评估中国科学家的与会申请。10日,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Charles Bolden)表示,中国研究人员被拒绝参会,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再次申请,并通过已有的针对外国人的安全审查,就会被接纳参与本次会议。”

“由于美国科学家的反对,开普勒科学会议将向中国学者开放。可不幸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停摆’,新的申请可能无法得到及时处理,会议可能被延迟或取消。不过,限制已被取消,努力仍在

继续。”戴布拉·费舍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不是歧视”

谈及此事,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有制度阻碍很正常,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在交往中时时会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科研交流方面,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设置相关障碍保护国家安全。我们不能说这是在歧视中国人。”

戴布拉·费舍尔也表示,对其博士生的限制并不是对中国的歧视,而是起源于对国家安全法律的误解。而且,就国家安全法而言,针对的也不只是中国,“以后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将来科学会议安排在没有这些限制的国家。”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除了此次NASA事件外,在我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合作中,确实有一些看似“不公平”的情况。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专项为例,在该专项中,中国投入的经费占该项目总经费的9%,而中国工作人员只占总人数的4%。

对于这一看似“不公平”情况,ITER中国办

公室一位知情人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他们并没有感到“不公平”。“ITER在招聘的时候会遵循统一的标准,也明确了根据投入经费的多少,确定最多能给我们多少岗位。但最终通过招聘的中国人员数量并不一定达到最高值。因此,尽管从数据上看是如此,但这其中并不存在‘不平等’。”

“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不希望中国发展,不希望中国在国际交流中受到启发,但国外大部分的科学家其实很愿意跟我们开展国际合作。”赵文津表示。

“更积极地参与”

在赵文津看来,中国在国际交流合作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国外拒绝我们参加,而是我们拒绝参加。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曾有关于建立月球坐标系的国际会议再三向中国发出邀请,希望中国参与讨论月球坐标、术语标准等问题,可最后中方依旧无人参会。“我当时和地调局、测绘局的各级领导讨论参会的事,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下转第2版)